

类说校注

上册

〔宋〕曾慥 编纂 王汝涛等 校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Z222

341/:1

322761

类说校注

宋曾慥编纂

王汝涛等校注

上册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* 2 0 3 2 2 7 6 1 3 *

本书在整理时承蒙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经费资助

类说校注

(上、下)

〔宋〕曾慥 编纂

王汝涛等 校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56.875 印张 5 插页 1362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

ISBN7-211-01981-6

K·125 定价: $\frac{\text{上}}{\text{下}}$ 95.00 元

類說序

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
僑寓銀宰居多暇日因集
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
成書名曰類說可以資治
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
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飭
之處水陸畢陳矣覽者其
詳擇焉紹興六年四月望
日溫陵曾慥引

宋刊本《类说》序

類說序

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喬寓銀峯居多暇
日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
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体助名教供談笑
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筋之處水陸
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

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

前 言

我国古代，有一种广征群书，摘录要点，然后编为一部分量较大的书籍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，此类书最早的是南朝萧梁时庾仲容的《子钞》，稍后有唐代马总的《意林》，而卷帙更多，内容更广，价值也更大的，当推南宋曾慥编纂的《类说》。

曾慥，字端伯，号至游居士，福建温陵（今泉州市）人，是北宋名臣曾公亮的五世孙。他在北宋宣和、靖康年间仕于汴京，任仓部员外郎。后因妻父吴玠在金灭北宋时替金人办事，又投靠伪楚傀儡皇帝张邦昌，宋高宗赵构即位后，窜谪以死。曾慥也被牵连，有人告他在张邦昌伪朝中“指斥国家，语言不顺”，于绍兴元年被免官。以后一段时期，他侨居银峰，闭门著述。《类说》就是这时编成的。后来，他又被秦桧起用，历任户部员外郎、太府正卿，总领京西湖北军马钱粮。最后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，于绍兴二十五年（一一五五）卒于官。曾慥博学能文，著述颇富，已知的除《类说》外，还有《宋百家诗选》、《乐府雅词》、《道枢》、《高斋诗话》和《高斋漫录》等。

《类说》，宋代书目著录五十卷，明天启刊本六十卷。南宋绍兴十年（一一四〇）由建阳麻沙书坊初刻^①。南宋中叶，建阳另有一种刻本。宝庆丙戌年（一二二六），建安郡守叶时又据麻沙本重刻^②。麻沙初刻本和宝庆本早已亡佚^③，南宋中叶建本也仅存三卷，现藏北京图书馆^④。明天启六年（一六二六），山阴岳钟秀据另一写本重刊印行^⑤，现在能见到的《类说》多卷本，就是这个天启本。

由于《类说》多半采自汉魏迄宋的小说、笔记，宋代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和元代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，都把它列入小说类。《书录解题》说此书

“所编传记小说古今凡二百六十余种”。实际上，此说有两点不够确切：第一，它所摘取的书，除了传记小说，还有《佛书杂说》、《传灯录》、《真诰》一类的宗教书籍，《尔雅》、《集韵》一类的字书和韵书，《淮南子》、《吴子》一类的子书，《难经》一类的医书，《相马经》、《相鹤经》等生物类书籍，《庐山记》、《诸山记》等地理书，《茶谱》、《海棠谱》一类谈种植的书，《书薮》、《画品》一类谈艺术的书，甚至有专谈文房四宝的《文房四谱》、《砚谱》和谈阴阳风水的《地理新书》，等等。第二，它涉及的书籍，没有二百六十余种，只有近二百五十种（最后一种补遗性质的《拾遗类总》涉及的书目不计在内）。

《类说》有什么价值？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其书体例略仿马总《意林》，每一书各删削原文，而取其奇丽之语，仍存原目于条首……南宋之初，古籍多存，槧又精于裁鉴，故所甄录，大都遗文僻典，可以裨助多闻。又每书虽经节录，其存于今者，以原本相较，未尝改窜一词。”这一评价，虽尚有可议之处，然而代表了旧时学者的看法，还是比较允当的。只是所谓“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”一语，未免把《类说》的价值说得低了一些。

我国古代一些辑录前代文献汇编的书籍，其最大价值，在于保存着后来已经亡佚了的典籍。宋初编纂的《太平御览》与《太平广记》，其所以屡被后代学者称道，原因即在于此。《类说》与《太平广记》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：二书均以小说笔记为主，收入大量前代作品，并保存了已佚典籍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《类说》在《太平广记》之后编成，所取用书籍，不少却是《太平广记》没有涉及的。我们作了一个概略的统计，《类说》取用的二百五十种书中，已佚而仅见于《类说》的约五十种，例如有名的《木兰诗》全文，后人只知它载于宋郭茂倩编的《乐府诗集》中，而《类说》收录已佚的唐吴兢编的《古乐府》二十九则，其中有些诗

全文，不少字句与《乐府诗集》所录不同，应该说，它更接近于原诗面目，有很大的资料价值。

五十种之外的很大一部分，虽然已被某些书辑入，有的却以《类说》为底本移置，有的可与《类说》所收的详略互见。可以说，《类说》在五十种书之外，又保存了若干种书的佚篇章。例如，卷十三的《茶录》所收各条，与《百川学海》本《茶录》所收者完全不同，可能两者均非原本，但各自保存了其书的一部分；卷二十一的《明皇十七事》，出自《次柳氏旧闻》，比顾氏文房本旧闻多出五事；卷二十三《续博物志》共收二十三条，而《太平广记》仅收一条，《说郛》仅收七条；《荆湖近事》于《说郛》中为五条，《类说》卷二十二却收了十五条。

有一些书，今传世的几种不同版本，有的收录篇目独多，多出的篇目引起聚讼，或攻击其为伪，或坚持其为真。《玄怪录》就属于此类，传世本多只收入辑自《太平广记》中的三十三则，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陈应翔刻本却收了四十四则。其多收的十一则中，有七则见于《类说》的《幽（宋人避讳改玄为幽）怪录》。这至少可以证明陈本是有所据的，对最后解决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旁证。

《类说》除有保存古籍的重大价值外，还有三个特点值得一提：第一，本书现存的明天启本虽有缺陷，但以之参校古籍，尚能起正误补遗的作用。例如：《太平广记》收录的《汉武帝内传》，原脱“朱鸟窗”一段，《类说》卷一的《东方朔窥窗》一则，正补其缺，后世的道藏本或即据此以补入。《类说》卷二十三《食螭》一则，原为张华《博物志》的佚文，今人已自《太平御览》中发现此条出自《博物志》，可证《类说》引录之不谬。今传世的古籍，明以后版本为多。明人刻书，每多率意删改原文，不少古书被改得失却本来面目。《类说》所据为宋代典籍，有些书的单行本虽为

书贾窜改，但收录于《类说》中者，却独存原文，可作后代校书的根据。第二，本书除了提供“遗文僻典”以“裨助多闻”外，还有两个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优点：一是选录某书时只选取其精采条目而弃置其平庸无奇者；二是将长篇冗赘之文缩短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这也就是“提要钩玄”的工作，对不能遍观群书的人来说，提供了一些“精华”。第三，由于《类说》多存旧文，其中有些资料可作文学史研究的课题。例如《广异记》，《太平广记》收入的近三百篇中多有叙事重出者，有人以为系作者戴孚编录多种书籍而成，并非创作。《类说》所收十八篇，见于《太平广记》的，有的却不作出自《广异记》。《广异记》是否为唐代小说的一个选本，正可据以研究。又如元稹的《莺莺传》，在《类说》中题作《传奇》。今人称唐代言文小说为“传奇”，得名的由来多以为渊源于裴铏的小说《传奇》。有了《类说》这个证据，上述说法就值得考虑。裴铏《传奇》乃志怪小说，据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对古小说的分类，记人间事者为传奇，以与记神仙怪异之事的志怪对举，可知“传奇”得名的由来乃元稹《莺莺传》，与裴铏《传奇》无涉。而传奇仅为唐代小说中的一部分，不能以之代表整个唐代小说。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今存的天启本《类说》有不少缺陷。一是文字错讹脱衍过多。如卷十一的《幽明录·人言鬼可憎》：“阮德如尝登厕，见一鬼……着白单衣，手上摸……”这里的“手上摸”，系“平上帻”之误。卷十五的《侯鯖录·天下生齿数》，记晋代人口为“二万四千五百”，此说大误，应作“二百四十五万”。二是随意妄改。典型的例子是卷四《西京杂记·至诚则金石为开》中有这么两句：“葛洪以问，扬雄曰：‘至诚则金石为开’。”葛洪是晋人，扬雄是西汉末人，二人怎么谈起话来了？用它本一对勘，“葛洪”本作“余”字。原来《西京杂记》托名刘歆所撰，“余”乃

刘歆自称，刘歆与扬雄是同时代人，自然可以对话。《类说》采用葛洪撰《西京杂记》的说法，却将“余”字改作葛洪，因而闹出“关公战秦琼”式的笑话。三是引书错误。例如卷三《神仙传》的《飚车羽轮》、《修本草》、《落翻山》和《新宫铭》，均出自它书，与《神仙传》无涉。四是刊刻粗略。比较多的是条目的首句缺主语，导致句意不全或句子不通。如卷一《七萃之士》的“饮天子蠲山之上”句上就有缺文，使人弄不清饮为何者？卷十《张子野诗》的头一句原为“张子野诗笔老妙”，由于“张子野诗”被移置为题目，剩下的“笔老妙”三字，就令人难以理解了。此外，体例也不统一。有些条目如《仇池笔记》等全抄原文，大部分却删改过多。不少条目的字数也悬殊过大。原刻中的双行小字，有的是注释，有的则为正文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全书有二十五则有目无文^⑥，所列文题，均摘自上一则文字，如卷一《穆天子传》的《玉果璿珠》，就是从上则《七萃之士》中的“天子之宝器玉果、璿珠、烛银”等语摘录的；《赵后外传》的《祸水灭火》，也是从上则《新兴髻慵来妆》中的“此祸水也，灭火必矣”一语摘录的。所有这些，看来都不是《类说》原作。

以上缺陷，多是编者、抄者、刻者粗心所致。曾慥博学能文，为什么会编出文字不通的句子呢？我们用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《类说》的《仇池笔记》与天启本同书对校，发现它在宋本中为一卷，共七十则，天启本则扩为两卷，共一百三十八则，字数也几乎增加一倍，天启本多出来的内容是谁编入，又在何时编入的呢？它是《类说》的本来面目吗？再考曾慥的《类说》序，传世的有两种，一种在“采摭事实，编纂成书”句下，多了一句“分五十卷”。这说明《类说》原为五十卷。清人陆心源在其《秦西岩影宋宝庆本类说跋》和《传录宋麻沙本类说跋》中，就分别指出宋代两种刻本的《类说》都是五十卷。另外，据《宋史·艺

文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和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等书著录，《类说》也均为五十卷。以上除《宋史》为元末所修（其艺文志部分当据旧目）外，另二书均宋末所撰。陈振孙理宗端平中为官，距《类说》成书的绍兴六年仅百年，所录应可信。宋人著录谓《类说》为六十卷者，仅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然《读书志》收书截止于北宋末，南宋部分为后人所补，真伪难辨。因此，应该相信《类说》原本为五十卷。那末，它在何时被扩增为六十卷呢？据明万历年间赵开美撰的《仇池笔记序》，他重刻的《仇池笔记》，得自曾慥《类说》。按此书文字与《类说》六十卷本目录完全一样。由此看来，《类说》多出的十卷，很可能是明人掺入的。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：《类说》卷四十三题为《文心雕龙》的两条，实际出自元代的《农桑辑要》。这显然是后代书贾掺入的。明人印书，爱窜改原文，并且改动书名，妄题撰人。特别是“巾箱本”和书贾翻刻的书，舛误百出，谬种流传。这十卷书的增入，方法又很巧妙，它不是成卷地增入原书，而是每卷书中各增入若干条，然后重新析卷，所增入者散入各卷之中，藉以消灭作伪的痕迹。我们曾就《类说》宋本的《仇池笔记》与天启本同书互校，发现文字舛错者多出自天启本，而宋本无误。可惜宋本《类说》只残存三卷，否则据以恢复《类说》之本来面目，就可以发现前面所指出的种种缺陷，有多少该由曾慥负责的了。

关于本书的校勘，由于今存《类说》的多卷本只有一种天启本，无它本可据以校，只好就所收的二百五十种书取原书校勘。原书已佚者不出校；原书今有善本传世者，尽量取能觅到的较好版本校勘；原书存于各种丛书中，据其中所入者对校。有时据两种以上不同的版本以校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只取一种。总之，有底本可据者校，无则不出校文。对于《类说》中缩写、改写的部分，只要不违反原意和费解的，也不出校文。原书明显抄错、刻错的字，

均迳行改正，并出校说明。我们据以校勘的书籍甚多，都在每种书名下注明，这里从略。

关于本书的注释，我们遵循了这样两个原则：一是习见的人名、典故，一般不注；二是注文力求简洁，说明问题即可。另外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全文，有些虽非典故，也加了注释。原书有双行小字夹注的，为便于排印，改为单行，用〔 〕号括起。又偶有眉批，似非曾慥所加，没有照录。原文旁用墨笔涂改的字，可能是刻版后的校文，依改后文字录写，不再保存涂改原状。

为了便于寻检，我们将原书的“类说目录”加以调整，重编一个总目，内容包括序文、引用书目、正文和有关的附录。各条的细目，仍按原样分别列于各卷之前。又，《类说》宋本于每种书名下，均列作者姓名，天启本却全部删去。对此，凡能考得者，我们均于注中补入。

本书校注的分工是：一至十二卷，王汝涛；十三至二十四卷，胡济泉；二十五至三十六卷，赵炯；三十七至四十八卷，刘茂辰；四十九至六十卷，刘瑞轩。全书由王汝涛统一审定。限于水平，我们的工作会有不少失误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王汝涛

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写定于山东临沂

①②见南宋叶时《类说序》。

③清人陆心源藏有明人传录的麻沙本和影写的宝庆本《类说》各一部，见所作《秦西岩影写宋宝庆本〈类说〉跋》、《传录宋麻沙本〈类说〉跋》（载《仪顾堂续跋》卷十）。这两部书已传至日本。

④北京图书馆藏的宋本三卷为《仇池笔记》，《东轩杂录》，《隐斋闲览》。据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这三卷是南宋中叶建阳刻本。

⑤岳钟秀：《订刊〈类说〉序》。

⑥天启本有目无文的二十五则为：卷一《穆天子传》的《玉果璿珠》，《赵后外

传》的《祸水灭火》、《箸击玉瓯》、《留仙裙》、《紫玉九雏钗》，《杨妃外传》的《得宝子》、《七宝冠》、《琐子金带》、《请一缠头》、《猪龙》、《元始孔昇真人》；卷一四《因话录》的《年满令史》、《错喉》、《哄堂》；卷一六《乐府杂录》的《阿母钱树子倒》，《倦游杂录》的《倚阁春秋》；卷一七《东轩杂录》的《见水银一钱知制诰一日无恨》；卷一八《湘山野录》的《泥金双带写诗》；卷一九《幕府燕闲录》的《不应为从重》；卷二〇《传灯录》的《四谛法轮》、《金冠高七多罗树》、《壁观一念回机只履》、《拆幔幢》、《门外觅三车》；卷二七《外史蒨机》的《醉髭》。以下书内各卷不一一说明。

类说序^①

小道可观，圣人之训也。余侨寓银峰，居多暇日。因集百家之说，采摭事实，编纂成书，分五十卷^②，名曰《类说》。可以资治体，助名教、供谈笑、广见闻。如嗜常珍，不废异馔。下箸之处，水陆俱陈矣。览者其详择焉。绍兴六年四月望日，温陵曾慥引。

^①这是曾慥原序，在天启本首卷之前的三篇序中，次列最后，现移至前面。^②北京图书馆藏宋本《类说》三卷，前有序，其余文字全同本序，而独无“分五十卷”四字。

订刊类说序^①

尝闻徐节孝先生好读人所未见之书，其所云未见者即在所常见之中。唯是寒门叹孙楼之无从，世族苦邳架之难遍。又且以相如之俳，夺元凯之癖，于今而谭博物，盖其鲜哉。余治新之暇，每从马康庄先生问奇字，以先生读书中秘，见人所未见者多矣。一日，以所参阅宋人《类说》，俾余订正而刊行焉。命之曰：“是编久藏笥中，每与家弟仲良扬推今古，取以印证，独憾写本未刊，难公诸众。因谋汗竹鸠工于前令司公。一时群情踊跃，有郡伯赵公偕内乡董公、浙川饶公、叶县王公俱欲捐俸赞成，竟以司公转官，甫杀青而止。子是之来，若有待也。”余受简，以订正自任。丙夜政暇，次第取而读之，悉加考核。虽不能辨蹲鸱之羊，庶或驱渡河之豕。随肆梓人而飨廩之。殚精一载，始告成矣。维时康庄先生奉召归朝，鼓篋成均，主张文教。余请撰序文，弁诸简首。至其溯源流，纪年月，倘亦订正者事乎？于是取编辑原序读之。盖此书成于宋绍兴六年曾公慥之手，计六十卷。名之曰《类说》者，非如《事文类聚》、《合璧事类》等书，取资帖括之为类也。上自

紫盖黄垆，下及昆虫草木，无不包罗焉；内而修身养命，外而经国字牘，无不该遍焉；食息起居之节，怡情玩物之宜，无不冥搜而骈集焉，若是乎弗类也者。独其取类极博而择类极精，珠汇璧萃，语语会心，事事中解。虽云无远弗届乎，与彼荒唐俶诡之书弗类也；虽云无细不备乎，与彼凡庸俚俗之书弗类也。无问人之见与未见，总为世间世不可少者，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其说也长而其为类也大矣。粤稽古人淹贯灵通，多是神明寄会，或不借照于记事之珠。乃今胜士韵流，往往寓聪明于耳目。倘按籍而有获焉，则平日用之不误、问之不知者，一旦印证于斯编，宁不触类而称快也哉！此畴昔曾先生编辑之初心，而亦康庄先生参阅之美意也。虽然，事理不易，时变日新，由绍兴^①丙辰迄今天启丙寅，五百年来，纪事之书又不知凡几矣。宏词大训，野史稗官，倘尽在天禄石渠间乎？于兹漱芳润而采菁华以为《类说》者续，莫便于康庄先生，尤莫善于康庄先生，是所望于词林鸿笔者云。皇明天启六年丙寅清和月，知新野县事，山阳岳钟秀于宣甫，书于署之冰玉堂。

①这是天启本《类说》序，原居三序之首，今改列第二。②原误作“圣”，迳改。

类说序^①

前言往行，君子贵于多识；稗官小说；良史列之九流。曾公所编《类说》，盖此意也。余旧藏麻沙书市绍兴庚申年^②所刊本，字小而刻画不精，且多舛误，意必有续刊大字善本。分符此来，偏令搜访，咸无焉，併板亦不存矣。因取所藏本，稍加是正，钺板于郡斋，庶可寿此书。博士或有志于圣门“友多闻”之训，当谓不为无补。宝庆丙戌^③八月初吉，古杭叶时书于建中堂。

①这是《类说》宝庆重刊本的序，原次列于天启本《订刊类说序》之后，今改列第三。此次重刊距绍兴初刊本已近九十年。②此年为绍兴十年。③即宝庆三年。

总 目

曾慥原序	(1)
岳钟秀序	(1)
叶时序	(2)
类说目录	(1)
类说	(1)
附录	
福建通志曾慥传	(1796)
各家著录及题跋	(1796)

类说目录

卷一

- 穆天子传 (1)
汉武帝内传 (1)
赵后外传 (2)
杨妃外传 (2)
列女传 (3)

卷二

- 高士传 (33)
逸士传 (33)
襄阳耆旧传 (33)
邨侯家传 (34)
名臣传 (34)

卷三

- 列仙传 (57)
神仙传 (57)
续仙传 (58)
王氏神仙传 (59)
高道传 (59)

卷四

- 西京杂记 (85)
两京杂记 (86)
秦京杂记 (86)
番禺杂记 (86)
大业杂记 (87)
玉箱杂记 (87)

- 青箱杂记 (87)

卷五

- 燕北杂记 (126)
洞冥记 (126)
十洲记 (127)
拾遗记 (127)
冥祥记 (129)
齐谐记 (129)

卷六

- 续齐谐记 (160)
荆楚岁时记 (160)
秦中岁时记 (160)
洛阳伽蓝记 (161)
南部烟花记 (161)
河洛记 (161)
传记 (162)
景龙文馆记 (162)
御史台记 (162)
封氏闻见记 (163)
开天传信记 (163)
庐陵官下记 (164)
海物异名记 (164)

卷七

- 唐宝记 (204)
水衡记 (204)